引子　宋元学术概论

两宋是中国学术史发展的重要时期。王国维认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① 陈寅恪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 宋元的诸多学术领域,包括经学、理学、史学、科技、佛道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本章首先论述宋代学术发展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概述宋元学术发展的各个方面及其主要特征。

第一节　两宋学术演进的社会背景

自唐中叶至宋初，中国学术史开始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变革。那些历来以承担知识的创造和传承为使命的儒家士大夫再次成为这场学术思潮的主要力量，他们从传统经学的领域内，创造出了影响此后一千多年的新兴学术思潮，同时也推动着其他学术领域的一系列变革和发展。当然，这一新兴学术思潮的兴起，不仅仅有着学术史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史的原因。

唐宋之际，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均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对社会思想意识有了新的要求，进而影响到了与社会意识密切相关的学术领域，导致了学术史的一场重大变革。

①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第 64 页。

②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24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首先，唐宋之际，中国的社会经济方面正在发生重要演变。魏晋南北朝以来所形成的士族豪门地主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庶族地主的大量涌现。这样，原来那种由士族门阀对荫庇制下的部曲、佃客进行直接人身控制的剥削方式被废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庶族地主通过租佃制对客户进行剥削的方式。这种通过契约和高利贷来剥削农民的方式，使得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弱。应该说，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宋代的社会经济有了重要的发展。如农业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有了新的改善,手工业、科学技术也有了突出的发展，皆是明显的证明。

但是，这种新的经济制度又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租佃制固然能使农民对地主的依附性减弱，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废弃了均田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而加速了地主的土地兼并。北宋仁宗时期“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已成俗”①。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使得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加剧了。

宋代经济还有一个重大演变发展，就是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宋代的矿业、冶金、陶瓷、印刷等行业均取得空前的发展，生产技术大大改进，生产规模也很庞大。在那些大工场中，大量雇用着专业化的劳动力。与此相关，宋代的商业贸易十分繁荣,货币发行数量激增,不仅发行了铜币、铁币、铅币,同时正式发行了纸币(称交子、钱引、会子、关子)。宋代货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工商业发展的结果。由于货币的发展，相应也促进了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繁荣。所以，宋代国家的财源主要依赖于商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财政收入已与农业税收持平甚至超过农业税。与工商业发达繁荣密切相关的是城市市民阶层的

① 《宋史·食货志》。

兴起，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方面的特点。

其次，从政治方面看。赵宋王朝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化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宋朝统治者在结束了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之后，吸取了以往因藩镇割据而导致政治动乱的经验教训,采取所谓‘ 强干弱枝 ’的政策,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宋初开国太祖赵匡胤陆续解除节度使的兵权,以文臣代替武将,并将全国精兵收编为禁军,禁军的调动、作战,都受到皇帝的直接控制,以加强皇帝对军权的控制，防止将领因拥有军权而兵变的可能性。在官制方面，赵宋王朝还将中央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皇帝除直接统属政事、军务、财政三大系统之外,另设御史台司监察,以控制科举取士权。此外，宋王朝还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州县的控制,各州直接隶属中央,由皇帝主持委派地主官吏,实行任期制，并另设通判以与知州互相牵制。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对避免因封建割据而带来的战乱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是，宋朝统治者这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也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弊端。首先，他们为防止兵变而将军事权力集中于帝王一身,禁军常处于‘ 兵无常帅,帅无常师 ’的状态,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宋朝在和边邻的辽、西夏的战争中屡屡失败，与此不无密切的关系。其次，宋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致使官僚队伍大大扩展,但许多官员往往是有官无职，致使冗员增加。这种官僚机构行政效率极低，尤其是给国家带来了十分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宋朝政府陷入经济的困境。其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还带来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性格、品行的优劣，和整个国家的治乱息息相关。一个任性、暴虐的专制君主,更加容易给国家、人民带来无穷的灾祸,危及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宋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均对社会伦常秩序的稳定提出了新的要求。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宗法型国家，儒家文化在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唐宋时期经济、政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而增强了对儒家伦理道德调节功能的要求。

宋元学术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倡导复兴儒学，重振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把儒家伦理建立在关于终极存在的本体论基础之上，皆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挥儒家伦理的道德调节功能，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理学家们热心倡导的纲常伦理、存理灭欲、义利之辨等等，往往具有双重的道德调节作用。首先，它要求人身依附关系减弱的农民能够自觉地遵守封建秩序，成为不犯上作乱的顺民。其次，它也要求具有经济实力、政治势力的地主阶级从长远利益出发，自觉遏制自己贪婪的欲望，不要无限度地掠夺、压榨农民。这一切，皆需要强化道德的调节功能。理学倡导复兴儒学、重振儒家伦理，正反映了这种社会的要求。

理学思潮在北宋时期兴起，同样也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逐步强化的政治要求。理学家们复兴先秦儒学，重振儒家纲常伦理，以服务于现实政治。理学在政治方面也具有双重的功能，一方面，具有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功能，儒家历来重视君臣父子的纲常秩序，理学以复兴儒家伦理为核心，将这种纲常秩序上升为“天理”，肯定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要求人民自觉服从这种统治，有益于专制集权的政治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化儒家伦理对政治权力加以制约和调节的功能。儒家伦理所以标榜“仁政”、“德治”，完全是为了实现用道德制约、调节政治权力的目的，使这种专制权力能纳入正常的政治秩序之中，不要在无限的膨胀中毁灭自己。理学家们对帝王们大谈“格君心之非”、“存理灭欲”，企图将这种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纳入“天理”的支配之下，正是为了用儒家伦理制约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实

现用伦理调节政治的功能。由此可见，理学思潮在北宋兴起，与当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集中的政治背景有关。

古代中国任何一场学术史的变革和发展，均与社会史的变革发展密切相关，儒家士大夫们很难完全脱离社会政治而独立从事学术活动。正如龚自珍所说“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① 当社会处在变革、发展时期，敏感的儒家士大夫即开始思考新的学术变革。宋代学术高潮的兴起，正是这种社会变革的时代要求。

第二节　宋元学术的文化背景

宋元学术的兴盛，还与整个中国文化史发展的背景、趋势密切相关。如果不了解宋元学术兴起的文化背景，就不可能认识和理解宋元学术崛起的文化原因、学术特征和学术成就。

宋元学术的文化背景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　复兴儒学

在先秦，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本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自汉武帝采纳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不仅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关儒家思想的学术形态——经学，亦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所以，两汉时期，儒家经学的研究几乎吸引了所有的学者、读书人，经学成了当时学术界惟一受到普遍重视的学问。然而，儒家经学独霸天下的局面并没有能维持很久，魏晋、隋唐之时，以道家学术思想为基础的玄学、中国本土的道教与从印度传入的佛学等相继兴起，吸引了大批文人学者，佛道之学演化为一股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巨大影响的新兴学术思潮，这时，儒家经学的地位

① 《龚自珍全集·治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受到了动摇。

然而，儒学不仅是一种以知识的研究、积累为目的的学术，更是一种规定国家体制、政治运行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规范。所以，儒家经学的衰落远远超出其学术史的意义，而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秩序的维系和稳定。这时，社会感到有对儒家学说的强烈的需求，一部分儒家士大夫开始呼吁、倡导复兴儒学。唐中叶兴起的古文运动，应看做是这场复兴儒学文化思潮的开始。

韩愈（768—824）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时期复兴儒学文化思潮的倡导者，故也是宋代学术之兴的肇启者。钱穆认为："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① 韩愈所以要求复兴儒学，根本宗旨在价值体系的"道"。他的古文运动是以"文以载道"为宗旨，他还著有《原道》，可以说是他这一主张的思想纲领。他认为儒家之"道"与佛、老之"道"有着根本的区别。他说：

> 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②

韩愈一方面强调华夏文明的核心是从尧舜传之孔孟的一以贯之的"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的千多年此道统已经断绝。这样，他就否定了两汉经学在传承孔孟道统方面的意义和地位，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将要继承儒家道统、复兴儒学的文化使命。韩愈的"道统论"和"文以载道"论，表达了唐宋之际复兴儒学的时代要求，对宋代学术思潮的勃兴产

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7 年，第 1 页。
② 《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道》。

生了很大的影响。

韩愈以“原道”为旗帜而倡导复兴儒学,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儒学复兴运动。复兴者们不仅仅张扬儒家价值系统的“道”,同时还努力重建儒家知识系统的“学”。韩愈在《原道》中引述了《礼记》中《大学》篇的观点,而《大学》在宋代是《四书》之一,在宋代学术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另一位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李翱,则强调了子思所作的《中庸》,《中庸》后来成了宋代经学的主要典籍《四书》之一。他还深入探讨了人的性与情的关系问题,认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①。他强调人性无不善,不善者乃情之所为,故而主张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复性”的目的。这些学术观点,主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孟子》、《中庸》、《大学》,同时也吸取了佛道之学,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因此,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不但与两汉时期的官方儒学——经学不同,也与先秦原始儒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变化。

唐中叶的复兴儒学运动,在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的积极倡导下,还只是一个开端。到了北宋,很快就形成了一股普遍的社会思潮。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开始,就继承了韩愈提倡古文、复兴儒家之道的精神,立志于道学的创建。石介曾批评唐代以来流行的浮华虚空的文风,倡导儒家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② 他们在倡扬复兴儒家之道的同时,批判了佛道二教及其他异端邪说。石介著《辨惑篇》,反对佛道二教,人们评价他“尤勇攻佛老,奋笔如挥戈”(欧阳修语)。孙复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宣扬道统论,一方面力辟佛老之学,他说:“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自汉至唐以文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庾妖艳邪侈之

① 《李文公集》卷二《复性书上》。

② 《徂徕石先生集》第五《怪说下》。

辞。’① 显然，他也认为汉唐以来的辞章之学、佛者之学皆背离了儒家道统，并希望要复兴儒家之道。他研究《春秋》之学，阐发《春秋》大义，其目的也在于张扬孔子之道。除上面所讲的‘宋初三先生’之外，庆历时代的范仲淹、欧阳修也是北宋初倡导复兴儒学、批判佛老之学的重要人物。欧阳修主张为学者应以‘道胜’而不以‘文胜’，主张‘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②。他也批判佛教，认为‘佛之法可谓奸且邪矣’。

北宋初年这些儒家士大夫们在倡导复兴儒学方面尚只是开端，此后，相继又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儒学学者，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等人及其弟子，他们继续张扬韩愈提出的‘道统说’，以提高儒学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同时，他们精研儒家经典，阐发儒学新义，为儒学创造了一套新的学术思想体系。他们的历史功绩不仅在‘原道’，即力图恢复儒家的价值体系，同时也是希望‘原学’，即要建立一套新的儒学知识体系。

二 疑经风气

如前所述，两汉时期‘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主流学术形式——儒家经学。两汉时期的经学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和繁荣之后，很快就衰落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汉代经学要求严守‘家法’、‘师法’，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使得经学研究日益封闭、狭窄，大大限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汉儒治经分为今文经、古文经两大派，两派经学均有自己的严重弊端。今文经学注重以经学服务于现实政治，故而在治经时常常牵强附会地大讲经学的‘微言大义’，以至于在严肃的学术中出现了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古文经学则重视对经书的历史考察，通过文字训诂而研究原典，

① 《睢阳子集补》。

②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吴充秀才书》。

但是，在此同时又出现了繁杂琐碎、远离经义的弊端。到了唐初,孔颖达著《五经正义》,仍沿袭汉儒治经传统,而将唐以前注疏经书的成果作了综合总结。《五经正义》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而绝不在传注之外发挥自己的见解。物极必反，严守注疏传统的汉唐经学面临危机。唐中叶以后，学术界出现了敢于疑经的学者群。

唐中叶时的疑经现象主要是怀疑汉唐的经学注疏，要求突破汉唐经学注疏传统,其代表人物是啖助、赵匡、陆淳师生三人。他们均是研治《春秋》学者,啖助著有《春秋统例》6卷，后由赵匡、陆淳整理,定名为《春秋集传纂例》,另陆淳撰有《春秋微旨》3卷、《春秋集传辨疑》10卷。这些《春秋》学著作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敢于否定汉唐的传注，他们一方面“攻传之不合经”,另一方则要求“舍传求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先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破附会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① 他们敢于“舍传求经”、“攻传之不合经”,表明了他们对汉唐传注经学的怀疑和挑战。另外，他们也对经传作者提出怀疑，赵匡即怀疑《春秋左传》是不是左丘明所作,他说“:今观左氏经解浅于公、穀,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②

到了宋代庆历之后，疑经已形成为学术界的风气。陆游曾论述过这种疑经风气的兴起，他说：

>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③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六《经部·春秋集传纂例》,中华书局，1996年,第333页。

②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

③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

唐中叶赵匡等疑经，主要是对汉唐之传注的怀疑；到了宋庆历之后，学者们不仅敢于怀疑汉唐经师们所作的注疏及所阐发的经义，进而对部分经书的作者乃至于对经典本身均提出疑义。欧阳修是这股疑经风气的重要人物，他在《易童子问》中，率先提出“《系辞》以下非孔子作”的观点，直接对《易传》真实性提出怀疑。另外，他还撰有《毛诗本义》，对历来认为是子夏、毛公所作的大、小《诗序》提出怀疑。同时，他对《周礼》也表示出怀疑。苏轼之弟苏辙也对《诗序》、《周礼》表示怀疑。郑樵著有《诗辨妄》，将《诗序》指斥为“村野妄人”的作品，使向来受到尊崇的《诗序》受到极度的贬抑。另外如刘敞也是这股疑经思潮的重要推动者，他著有《七经小传》，杂论《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七经经义。他不但怀疑汉唐经学的注疏之学，甚至对经文本身也表示怀疑，故在论述经义时多以己意改动或论断经文。王安石的新学对汉唐经学更是一个有力的否定。他不满汉唐传注经学，著有《三经新义》，对《书》、《周礼》、《诗》三部分儒经作了新的解释，结束了历来是汉儒传注经学独霸天下的局面。王应麟在评论北宋疑经风气时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则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①

在汉唐之时，学者们对经师的注疏都不敢稍有改动，更不用说对经文本身的怀疑和改动了。而北宋学术界的局面则发生了一个根本性转变，在苏轼等诸多学者的影响下，疑经竟演变为一种盛行的风习，司马光在《论风俗札子》中描述过当时的情形：

> 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

①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

郑为章句之学 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异说者，谓之精义。①

由此可见，疑经已经成为儒家士大夫中十分流行的风气，并一直由北宋影响到南宋。疑经思潮的出现，表明学术界对汉儒传注经学的严重不满，反映了旧的经学形态面临衰落、变革的处境。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解经方法和新的经学形态，也就是注重发挥经典中义理的史学。

三　三教融合

魏晋、隋唐之时,儒、佛、道三家学说呈鼎立之势。在中国学术史上，这三家学说本就各有其思想来源和学术特征，其价值观念、学术思想有极大的区别，故而在魏晋、隋唐之时，就出现过种种社会矛盾和思想冲突，发生过许多儒佛之争、儒道之争、佛道之争的历史事件。

然而,在整个文化史上又出现了一个趋势,即儒、佛、道三家学说在展开冲突的同时，又在有意、自觉地吸收其他二家的学术思想。自魏晋开始,儒、佛、道之间就出现一些相互吸收、融合的现象。最初，主要是佛道两教为调和与儒学及纲常名教的矛盾，自觉地吸收儒学思想。到了唐以后，许多坚持以儒学为本的学者，开始主动、自觉地吸收佛、道的思想,以丰富、更新儒学,实现‘三教归一”。同时,唐宋以后的佛、道二教也加强了三教融合。这种三教兼融、三教归一的趋向，构成了宋元学术兴起的又一文化背景。

佛教很早就有意吸收、融合儒道思想。佛学自东汉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就一直希望能调和与中国主流文化——儒学的矛盾，故而竭力吸收儒家的思想。如汉献帝时有牟子著

①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四十二《论风俗札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理惑论》,即倡扬儒佛一致说。在魏晋隋唐之时,虽然佛学称盛,而且与儒、道之间冲突很多,但许多僧人、佛学著作均力图融合儒学。如东晋时期曾有过佛教僧人是否应向王侯行跪拜礼的争论,慧远力图证明僧人不应跪拜王者,但他在《沙门不敬王者论》这一著名论文中,仍然肯定佛教与儒家礼教的根本一致,认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①。此后,还有许多僧人往往直接融会儒家思想,或者是引证儒家经典和学说,以宣传、证明佛教思想。如无名氏所作《正诬论》中说:"佛与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顺,从之者吉,背之者凶。"② 该文将儒家所倡"忠孝信顺"的宗法政治道德规范纳入其佛学著作之中。还有的僧人则强调佛教教义本身就包含着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提出:"释氏之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③ 这样以证明儒、佛二家的根本一致,佛教不仅吸收儒学,同时也吸收道教的思想。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人们往往将佛学与神仙方术混同看待。牟子《理惑论》所论述的佛是"恍忽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蹈火不烧,履忍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④。这分明是中国古代神仙的形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在传授过程中又玄学化了,老庄的思想理论成为佛学阐释其教义的手段。道安、慧远等在论证佛学关于世界本空的教义时,就是吸收了道家、玄学的"出于自然"、"本无末有"的思想。隋唐之时,不少佛教教派和佛学著作直接吸收道教的教义和思想。如唐代的佛教密宗一派,就大量吸收了道教的思想与方法。密宗主张"即身成佛",就与道教"肉自成仙"的思想一致,密宗所讲"欢喜佛",可能来自于道教的"房中术",密宗所使用的祛邪的咒语,同

①见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弘明集》卷五。
②见无名氏:《正诬论》,《弘明集》卷一。
③见僧顺:《释三破论》,《弘明集》卷八。
④见牟子:《理惑论》,《弘明集》卷一。

样是受道教符箓咒术的影响。

同样,道教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是逐步地吸收、融合儒、佛的思想。道教毕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从它一产生开始，就在尽可能地接受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如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就表现出要融合儒学的思想倾向,他要求道教徒遵循“父慈、母爱、子孝、孙顺、兄良、弟恭”等宗法家族的道德，赞扬儒家三纲六纪的伦理准则。以后，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注意融会儒家学说。东晋时期的著名道士葛洪，是一个由儒生转化而成的道士。他在建立道教思想体系时,竭力吸收儒学思想。他的代表著作《抱朴子》对儒道之学评价说:“且夫养性者,道之余也 经世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而易俗，不惟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也，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① 所以，葛洪希望建立一种以道为本、以儒为末，儒道互补而并用的学说。此后的道教学者如陆修静、陶弘景等人还认真研究儒家经典，希望更多地引进儒家学说。陶弘景还著有《孝经论语集注并自立意》、《三礼序并自注》、《注尚书毛诗序》等,力求从儒家经典中吸收思想资料以丰富道教学说。传说中的吕洞宾更是将儒家伦理作为“四大支柱”,他说:“孝悌忠信为四大支柱，不竖其柱而用心，椽瓦何能成得大厦？”② 可见，道教在发展过程中，愈来愈积极吸收儒家学说。另外，道教也大量兼容、吸收佛学。道教的理论学说比较简单，不及佛学精深,所以,道士们亦有意吸取佛学,有的直接将佛教经典中的“佛说”改为“天尊曰”,使其又成为道经。甚至那些重要的道教经典,如陶弘景所作《真诰》,即为“窃佛家四十二章经为之”(朱熹语)。同时,在道教经典中,还大量引进“地狱”、“诸天”、“托生”、“劫数”、“观照”、“双遣”、“定慧”等佛学用语和观念。到了唐宋之时，道士们不满足于这种一般的仿效，

① 《抱朴子》卷七《塞难》。

② 《云巢语录》,载《道藏辑要》璧集第三册。

而是从义理与人生哲学方面去融合儒佛之学，倡导“性命双修”,或是‘引儒释之理证道,使学者知三教本一”。

早在佛教传入、道教创始之前，儒学就取得了独尊的社会地位。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化教育，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最初儒家学者对外来的佛学、民间的道教均持一种鄙夷、排斥的态度。但是，由于儒学亦有自己的局限，尤其是在宇宙观及心性论方面，均不及佛、道二教。加之汉代以来儒家经学的封闭、烦琐，限制了自身的发展。相反,佛、道两教既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又能主动融会儒家学说以获得传播、发展的条件。所以，魏晋南北朝以来，出现了一些儒家士大夫兼习佛老之学的现象。隋唐以来，许多儒家士大夫们往往是既讲儒学，又出入释老。唐中叶以来的古文派柳宗元、韩愈、李翱为抵御佛教的影响,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倡导复兴儒学的运动。但是就在倡导复兴儒学的同时，又出现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这些儒家学者又在大量吸收佛道二家的思想学说，而不仅仅是出入释老。柳宗元曾明确表示出对佛学的喜好，其原因就在于佛学能够帮助人们摆脱现实政治争斗的烦恼,实现‘乐山水而嗜闲安’的精神超脱,故而他充分肯定了佛学中的‘般若’、‘涅槃’、‘佛性’等学说。而韩愈的弟子李翱则更进了一步，他在自己的学说中直接糅合了佛教的理论。他提出了“性善情邪”的性情学说，一方面坚持了儒家性善论,认为‘性无不善”,另一方面则又否定人的情感欲望,提出‘情者妄也、邪也”;‘妄情灭息,本性清明”。这种以‘清明’论人性,以妄、邪说人情的观点,完全来自于佛学。同时,他所提出‘复性’的修养方法,诸如‘弗思弗虑,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方静之时,知心本无思者,是斋戒也”,这些方法,同样明显是从佛学中吸收而来。故而韩愈亦认为这种‘复性’说是‘杂佛老而言者也”。到了宋代,那些著名的理学家们多数都有从‘出入佛老’到‘反归圣学”的治学历程，他们虽然终于回到儒家圣人之学的立场，

但又大量接受了佛老之学的思想。佛学、道学中有关宇宙化生、心性本体、精神修养的思想、方法,均成为理学家们重新阐述儒家经典、建立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资源。甚至可以说,没有佛老之学,也就没有宋代的理学。

由上可见,虽然儒、佛、道三家学说各异,在历史上曾产生过种种矛盾和冲突,但三教融合已成为中国文化史发展的大趋势。尤重要的是,在经历了魏晋隋唐道、佛称盛的局面之后,许多儒家学者希望在融合佛道思想的基础上,重振孔孟之道,复兴儒学。这就使得中唐以后的中国文化有可能从“三教圆融”走向“三教归儒”,实现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和新儒学的崛起。

第三节 宋元学术发展概述

尽管两宋时期国势衰微、战争频繁,元代又是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是,宋元的学术发展则是中国学术史的重要阶段和繁荣时期。宋元两朝在经学、理学、史学、科技以及佛道宗教等方面,均有重大的发展,并且取得辉煌的学术成果。

经学一直是中国古代的学术主流。在经历了汉唐经学的兴衰之后,由于复兴儒学、疑经思潮的推动,宋代的学者们创立了一种以义理解经的新经学,也就是宋学。宋学既是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又是经学研究的一大学派。宋初孙复研究《春秋》之学,作《春秋尊王发微》、《春秋总论》;石介研究《易》学,著《易解》、《易口义》等,均是以儒家义理阐释经典,成为开宋学风气之先的人物。王安石作《三经新义》,完全舍弃汉儒传注经学,另创“新学”,成为以义理解经的宋学中重要学派之一。然而,真正奠定宋学学术格局和宋元经学形态的,则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北宋五子”。正如周予同先生所说:“欧阳修等人是在‘破’汉唐经学,而北宋五子的成就是‘立’的方面,其中以程颐的影响

最大。’① 他们不仅仅深入研究了《周易》、《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而且通过阐发经书中的义理,建立了一个包括天道、地道、人道在内的系统学说,而这一套学说在先秦、汉唐均是没有过的。不仅仅如此，他们还将经学的重点由汉儒推崇的‘五经’,而转变为《大学》、《中庸》、《孟子》、《论语》等‘四书’。如周敦颐综合《周易》、《中庸》而著《通书》,司马光著《大学广义》、《中庸广义》。二程则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列,作为儒家道统系列的主要典籍，要求学者深入研究和学习。到了南宋，朱熹用毕生精力,完成以阐发义理为主的《四书章句集注》。此后“四书”的地位越来越高,甚至超出‘五经’之上。因此,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出现,标志着宋代经学的完成,它对元、明、清各代均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宋学”是指经学的阶段和形态,如果从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的角度说，这一学术思潮又在历史上被称为“理学”或“道学”。因为宋代学者的宗旨不仅仅是在重新阐述经典,建立一种与汉唐经学并列的宋学。他们的学术使命更着重在建立一套包括宇宙论、社会道德论、心性论、修身功夫论等各种理论问题在内的思想体系，以和释老之学相抗衡，复兴儒学并承传道统。仅仅从经学史角度定义他们为‘宋学’,尚不足以说明他们的学术成就、特点与地位。周敦颐被称为理学开山祖,因为他的《太极图说》、《通书》首次将儒学伦理观念纳入到一个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化生以及立人极的宇宙论思想体系中去，为理学思想体系奠定了基本的框架，故而他被推崇为‘道学宗主’。张载则进一步以‘太虚即气’的气本论来统一宇宙本体,建立起包括太虚、气、神、性、心、诚、礼等范畴在内的思想体系。二程为了强调儒家伦理原则的绝对性,将其提升为‘天理’,以天理论来统一宇宙本体。同

①《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 897 页。

时,他还倡导“性即理”、“格物致知”,以建立“性与天道合一”的理学思想体系。二程的洛学经过其弟子们的传播,到南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他综合了濂(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等各家学说,建立了理气论、太极阴阳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论、心统性情论、格物致知论在内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学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理学的集大成的任务。南宋时期,还有其他理学家们建立了不同的理学学派,包括胡宏与张栻的湖湘学、吕祖谦的婺学、陆九渊的象山学派。其中尤其是陆九渊提出“心即理”、“发明本心”的学术宗旨,形成了与程朱理学相鼎立的心学派的学术思想。朱陆的学术分歧及其争辩,成为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另外,事功学派的陈亮、叶适因反对理学宗旨,两派思想也展开了学术论战,构成了宋代学术史百家争鸣的局面。宋理宗以后,程朱理学得到官方支持,其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到了元代,程朱理学在学术思想界取得了统治的地位,并演变为官学,所以元代的理学主要是朱学的传播和延续。当然,在一些理学家那里,也表现出朱陆合流的特征,反映了心学派继续存在和发展的趋势。

在经学与理学发达、繁荣的同时,宋代的史学成就也同样十分丰富。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①宋代史学之盛体现在史学成果的大量出现,各种体裁、不同内容和风格的史学著作不断出现,尤其是史学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种史学流派也在展开学术讨论和论战。总之,宋代史学十分繁荣、发达。欧阳修无疑是宋代史学上开风气的人物,他的史学成就很高。一方面,他倡扬孔孟道统,并希望在历史盛衰兴亡的变化中探询不变的“理”,成为引“理”入“史”的先驱人物;另一方面,他大胆地疑古辨伪,对《易传》、《周礼》、《毛诗》作了诸多考辨,还著述了《集古录》等在金石考据学方面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在历史文献学方面也卓有成

①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40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